



建筑·空间·城市

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研究论丛（2013）

高春花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建筑·空间·城市

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研究论丛（2013）

高春花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建筑·空间·城市：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研究论丛. 2013 /
高春花主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1-08912-6

I. ①建… II. ①高… III. ①建筑-文化-研究报告
-北京市-2013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48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字数：260 千字

定价：39.80 元

编委会

主任:宋国华 李先逵

副主任:高春花 孙希磊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高春花 孙希磊 肖建杰 刘临安

王锐英 李志国 秦红岭 张溢木

主编:高春花

副主编:孙希磊 秦红岭 张溢木

目 录

何以寄托“乡愁”

- 写在出版之前 (1)

建筑伦理篇

- 埃蒙·坎尼夫的城市伦理观评介 (3)
- 美国工程伦理教育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1)
- 《中庸》的生态思想对绿色建筑的启示 (17)
-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现代建筑审美
——以北京现代建筑为例 (23)
- 北京四合院砖雕艺术的文化解读与保护 (29)
- 论乔家大院建筑装饰的伦理意蕴 (38)
- 城市伦理建设与历史园林的湿地生态保护 (46)

空间哲学篇

- 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环境代际公平:维拉港城市空间正义个案研究 (53)
- 当代建筑自由化设计反思 (64)
- 城市公共空间的案例分析 (71)
- 论胶东传统民居海草房的营造接替 (78)

城市文化篇

- 上海与纽约国际化城市文化记忆对比 (87)
- 建筑扬尘行政管制与期待可能性及其展望 (96)
- 中国风水文化中的建筑选址原则 (107)
- 城市社区失独老人生存现状及解决途径 (116)
- 从“违建屋顶花园”谈高层住宅的屋顶绿化 (121)
- 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现状及节水建议的研究 (130)
- 历史的痕迹与交融:淮南市窑神庙遗址环境整治与展示设计 (139)
- 中国当代城市雕塑色彩初探 (151)
- 论北京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 (158)
- 城市历史景观与城市传统的表现 (170)
- 浅谈城市文脉与城市发展
——以北京的城市建筑文化更新发展为例 (175)
- 北京旧城历史街区与建筑旅游利用研究 (183)
- 对河南禹州阳翟古城墙展示利用的思考 (190)
- 论南京老城南的保护与改造 (197)
- 社会生态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205)
- 北京市农村社区封闭式管理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211)
- 浅析济南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泉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219)
- 20世纪初期法国作家绿蒂作品中的北京形象 (226)
- 浅析达达主义对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的影响 (231)
- 关于国内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思考
——以宁波美术馆为例 (237)
- 高校校园景观设计中的人文关怀 (246)
- 后 记 (252)

何以寄托“乡愁” ——写在出版之前

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大系统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2013年,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以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建筑与城市为主题,围绕绿色建筑与生态哲学、城镇化进程与价值观变迁、生态城市与生活方式、中西方社会思潮与城市文化等论题,展开了古与今、中与西、身与心的学术对话。呈现给大家的这部论丛就是这种对话的产物。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无论是上古的穴居野处还是现代的高楼大厦,都在遮风避雨的同时,诉说着人们对历史文化的感知。作为一种民族历史的产物,理想的建筑、空间和城市应该能够“留得住乡愁”。在这里,古老的遗址不是历史的尘埃,而是人们分享精神食粮的自由空间;过往的文物器具不是展柜中的摆设,而是散发着历史的魅力,镌刻着特定的精神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将建筑、空间和城市比作“历史博物馆”。由是观之,无论是筑造活动还是城市规划,一定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

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留住历史记忆,传承文化传统,彰显地域特点,展现民族风情。英国经济学家冯·哈耶克说:“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①传统建筑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她以一个“会说话”的物质载体,在表达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同时,也预示了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要给传统民居和乡村聚落留下足够的地盘,让川蜀民居和下沉式窑洞与高楼大厦实现古与今的交流对话。

建筑是无言的教化者,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容器,更应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功能的“精神安宅”。建筑与信仰、建筑与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建筑是一首哲理诗,那么这首诗的“诗眼”则是文明。神圣的教堂存放着欧美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中国古代的牌楼、寺庙、道观既体现了平衡、和谐与对称的建筑制式,也表现了中国人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更发挥着劝善、训导、惩恶等道德教育功能。好的建筑应该离“上帝”最近。不论是早期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神学家相信,优雅的环境不是在腐化我们,也并非颓废者的放纵之所,而是潜移默化地推动人们接近完美。建筑对人类的塑造可能比经文更有效,一幢美丽的建筑能够增强人们向善的决心。因为人是感觉的造物,经由眼睛而非理智接受精神的律条,人的灵魂得到强化的概率会更高;通过凝视瓷砖的排列可以比研习福音更容易学到谦卑,经由一扇彩绘玻璃窗可能比通过一本圣书更能领会仁慈的本质。正因为建筑有如此强大的教化力量,所以它决不能够“骄纵”和“任性”。然而目前建筑学界流行着一股建筑设计的自由化思潮。一是建筑师过度张扬个性

^① 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页。

进而影响公共建筑设计的可接受性；二是建筑形态表达与日常生活逻辑相脱节；三是建筑的异形表象追求凌驾于建筑的功用追求之上；四是建筑师的“名望”弱化了建筑的社会伦理价值。然而，符合生态理想的建筑，应该满足居民的空间需求、展现当代社会发展能力、体现群体审美取向和实现文化传承。为此，一个可能奏效的药方是：加强建筑教育中的本分教育，建立建筑行业的职业伦理观；理顺正常化建筑思考力与建筑基本逻辑的关系；寻求师法自然、致敬传统的社会评判标准。只有在上述伦理价值的浸润下，建筑才可以供人们“诗意地栖居”。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任何有生命力的哲学，必定以回应现实问题为己任。在我国现阶段，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镇化带给人们的巨大冲击。然而，何种城镇化？谁之城镇化？

城镇化既不是摩天高楼，也不是汽车人流，而是在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公民精神的丰盈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它将改变依赖“土地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人的聚集，实现知识的聚集，从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不在于“快”，而在于“好”。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以市场化制度为本，创自由竞争之基，激发和保障人们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生态视域中的城镇化是一种低碳的城市化，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更好地提高国民的福祉。为此，应该加强低碳发展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理顺低碳发展的管理体制，完善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低碳发展的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在城镇化进程中，公众行为方式和消费选择是企业生产的方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盘,也是政府决策的指南针。换句话说,城镇化固然需要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但市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于城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目前我国流行着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即其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这个“符号象征意义”与人们的地位和身份相关,成为界定“我是谁”的物质标签。为此,要以适度消费来抑制畸形的消费观,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最低限度地生产废弃物,提倡面向未来的更加可持续性的生态消费方式。只有如此,城市才是可以寄托“乡愁”的人类美好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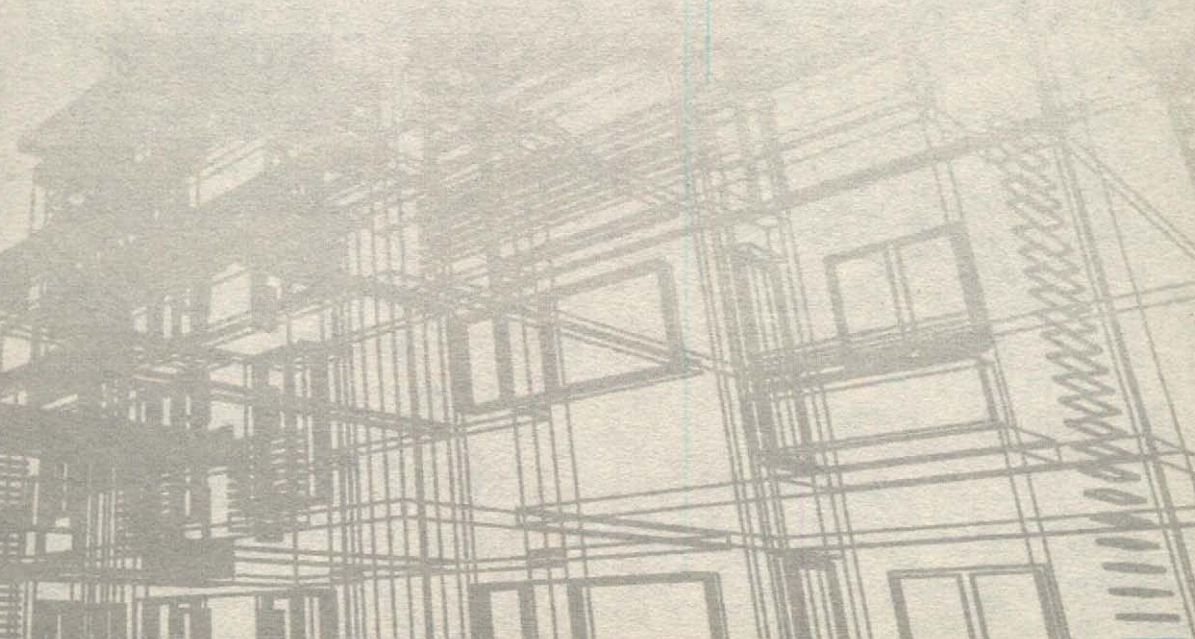
是为序。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

高春花

建筑伦理篇



埃蒙·坎尼夫的城市伦理观评介

秦红岭^①

城市空间特性的伦理维度是现当代城市设计中讨论的新问题。如何正确阐释城市设计与伦理的关系,以期创建一个伦理的城市环境,对现代城市设计理论的建构尤为重要。现任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建筑学院的埃蒙·坎尼夫(Eamonn Canniffe)在《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Urban Ethic: Design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2006)一书中,在回顾与分析城市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有关城市更新与当代城市生活矛盾的种种争论,阐释了城市的形式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美学状况之间的关系,并聚焦于城市的空间特性,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城市伦理的内涵,提出了由格局(patterns)、叙事(narratives)、纪念(monuments)与空间(spaces)构成的城市伦理之“四重模式”(a fourfold model)。坎尼夫的城市伦理观,既是一种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准则体系,也是一种走向伦理性城市的方法论,它对我们更加深入开展城市伦理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城市伦理价值的失落:城市设计问题的历史反思

回溯城市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建筑和城市的意义最终存在于历史和文化关系当中。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1]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设计问题的回顾与反思,旨在追寻和梳理城市的历史发展线索和文化背景,为的是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坎尼夫

^① 秦红岭,女,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

同样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割裂过去来理解现代城市是不可能的。在《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及《广场政治学:意大利广场的历史与意义》(*The Politics of the Piazza: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Italian square*, 2008)等书中,他主要以城市公共空间为例,阐述并分析了城市发展进程中建筑形式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轨迹,尤其是梳理了工业化之前传统城市的精神特质和伦理价值及工业化之后城市空间伦理价值的异化与失落。

在《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中,坎尼夫将城市发展的基本进程区分为历史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这三个阶段,主要探讨了这三个阶段城市发展的主题和作为一个社会伦理观念体现的城市空间形态的不同特征。

坎尼夫所称的历史城市(the historic city)大致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文化城市。历史城市是一种紧凑性城市,通常既有辨识性又容易认知。这个阶段的城市发展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即城市的建筑与空间如何才能反映并支持城市的精神特质,并通过具有高度意象性的场所,使市民牢固树立对城市的认同感。坎尼夫认为,宗教及其神力约束在古代城市的布局和社会结构方面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和古罗马人,建城都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城市的命运需要神的庇护和魔法的保护,因而城市建设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宗教仪式和宗教行为。他以古雅典城每年举行的“泛雅典娜节女神游行”为例,说明了宗教性公共生活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效应和诗意共鸣(poetic resonance),正是由市民互动而形成的神圣化与仪式化的城市公共生活,强化了人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坎尼夫认为,随着18世纪中后叶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及其所引发的对城市元素的非神秘化的解释,导致了对城市环境的伤害,而这恰恰是以生产效率为目标的工业城市(the industrial city)的主要特征。

18世纪下半叶,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城市时代。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虽然工业城市充分调动了制造业财富创造的潜能,但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结构混乱、城市环境恶化、住宅拥挤、疫病流行等问题迅速出现,且日益严重。一些城市观察家们,例如恩格斯,通过亲身的观察与交往,直接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尤其对曼彻斯特工人非人道的的生活条件有触目惊心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坎尼夫认为,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城市状况的描绘,表明了城市和建筑形态与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以及道德维度的重要性。

同时,18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标准性、利润率与批量生产之间的关联,都对城市设计产生了影响,使其回避了传统城市的伦理价值。工业化的模式带给城市的是更快的功能分区过程。功能分区的城市,创造了一种工业化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特性,即单调而乏味的环境,或者是工业区,或者是商业区,或者是居住区。这种功能分区使土地开发满足了制造业的需求,但在如何寻求公共建筑的代表性语言,以及营造友好的居住环境方面却并不成功。

尤其是当代的城市设计,在许多方面仍然完全受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提出的城市规划教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们都满腔热忱地贯彻着这样的规划策略,即用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取代传统城市的建筑形式。由此所导致的零乱的、单调乏味的“城市沙漠”现象,正是人们期待城市设计者们要解决的难题。

坎尼夫所说的后工业城市(the post-industrial city)主要是指20世纪晚期的西方发达城市。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城市体验是最基本的存在模式,但为什么对许多居民而言,那些丰富的城市设施变得如此让人疏远?而且,这样的城市环境表面上体现着公共价值,但实质上却表达着私人利益。他认为,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前提是运用城市总体控制规划,在一个更健康的城市环境中创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但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不能简略地说成是落入以下两种情形:一方面,高层建筑的发展形式、抽象的功能主义表达、缺乏明确界定的介入式空间,都让人认识到疏远感的产生既来自空间尺度,又来自可识别性的缺乏;另一方面,城市总体控制性规划又让人认识到,它消除了地域和地形因素上的差别,取而代之以普遍主义的解决方案。

如何才能从城市设计层面解决后工业城市所带来的问题(如无场所感的郊区化蔓延、城市设计与人的需要疏离)坎尼夫主要讨论了两个在理论上明显对立且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设计理论,即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与新现代主义(Neo-Modernism)。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新的城市设计运动。它旨在寻求扭转城市各个功能分区相互疏远的问题,赞同城市形成一种更为综合的整体,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准则强调界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以便居住区的市民中心在城市体系层次中具有明显的辨识度。新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认为不可改变的人性与技术的进步是一种共生关系,应借由理性的逻辑进行道德上的控制,因而主张重新恢复现代主义设计的一些理性的、次序的、功能性的特征。新现代主义抛弃了现代主义先驱

者们以改革者自居的伪装,赞成应服从市场的需求,但却很难满足创建全球城市过程中的人性化需要。

坎尼夫认为,无论是新城市主义在物理和视觉上的限制,还是新现代主义自我陶醉的精英主义的影响,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代城市问题,当代城市的现实状况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恢复城市主体地位的理论,而其出发点是相信城市有能力表达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包容相互对立的各方,鼓励多样化,反映个体的诉求。于是,在《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的第二部分“城市环境元素”中,坎尼夫将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所宣扬的建筑的伦理功能中的“伦理”引入到城市设计领域,提出了更广意义上的“城市伦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坎尼夫并没有明确界定“伦理”的含义,但他的城市伦理中的“伦理”一词的含义,与哈里斯所说的建筑伦理中的“伦理”一词的含义相同,即与希腊语 *ethos*(精神特质)更相关,而不是我们通常谈到“商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等应用伦理层面时的那种意思(如人际交往或控制工作行为的一套准则)。

二、城市伦理的四重模式

坎尼夫对当代城市的失望,主要源于他认为在当代城市中,伦理价值还远未被充分体现出来。因此,为了更加明确地展现伦理城市的精神特质,坎尼夫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从城市精神的层面,提出了当代城市空间设计的方法论,即他所说的城市设计元素的“四重模式”。这四重模式由四种城市设计元素构成,分别是格局、叙事、纪念和空间。在城市环境中,这四种元素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坎尼夫的主题——“城市伦理”。

坎尼夫提出的城市设计四重模式的表述,较为抽象和晦涩,也许这与他受海德格尔思想的推崇有关,他自称自己提出的四重模式是对海德格尔的宇宙(世界)四重结构的自觉回应。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定居在天、地、神、人这四元合一的结构之中,即拯救大地、接纳苍天、期待诸神、关怀人性。人以定居的方式保护着四重结构,使四者的本质得以显现。尽管坎尼夫的格局、叙事、纪念和空间比海德格尔的地、天、人、神更加具体,但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意义层次,对城市建筑这个特定研究任务而言,有相同的目的。

下面简要阐述坎尼夫提出的四种元素:

1. 格局(patterns)

城市格局这个元素,是一种存在于被动适应地形与有意识规划的主动干预

之间的现象,旨在确认建筑物和街道之间的关系,人口密集区域和空旷之地的关系,确保城市形态具有一定的秩序。初看之下,格局乃是财产分配与地形(topography)的功利主义产物,实际上它受理智建构与意义积累的影响。这种阐释使城市格局被看作是社会精神特质的物质表现形式。或者说,格局即便不是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反映,但至少它依赖对地方特性的理解。通过观察一个地区的连续性地图,例如罗马的托拉斯维特区(Trastevere),解读它们的格局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就可能超越单纯形式上的东西而阐释其所代表的地方特性和社会进程。坎尼夫提出,应重视历史城市的肌理及蕴藏于其后的精神实质在城市复兴中的价值,当代城市应重新规划城市的各个区域,使城市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丰富和紧密。

2. 叙事(narratives)

自古以来,叙事便在城市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本身就具有叙事的特征。坎尼夫认为,所谓叙事,是指运用对公民而言有重要意义的类比和意义元素等表达方式,为城市中人类活动的关键角色设定场景,使城市成为一种故事的集合。在功能方面,他将叙事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理解和归纳城市设计的意图,强化城市文脉之间的联系,进而有效地建构建筑及城市的社会文化意义。坎尼夫尤其强调,叙事空间可以理解为一种与“置身其中”的实地体验密切关联的建筑与城市空间,而只有体验才能产生场所精神。因而,坎尼夫提出对城市叙事进行解读的典型形式应该是,假想我们正经历一次穿越城市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经历与体验都融合在一起。坎尼夫反对城市设计中单一的主导性叙事,他建议城市应展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叙事,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他认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情境主义(situationist)以及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试图倡导对城市环境新的感知方式,为建设20世纪城市的多元叙事做出了有益尝试。

3. 纪念(monuments)

纪念这一术语,来自拉丁文“monere”,意思是“展示”,是一种明确地宣传公共信息的产物。坎尼夫所说的作为城市设计元素的纪念,主要指具有可识别性的、能够吸引公众参加公共活动的各种公共建筑,尤其是公共性文化建筑。他认为,纪念在强化支配性的叙事形象方面有悠久的传统。而当代城市的叙事,作为一种集体体验,镌刻在城市的各种纪念物之上。通过一个城市公共性的纪念建筑网络来理解和读懂一个城市,是一种最普通地了解城市历史的方式。纪念建筑语言所呈现出的建筑尺度与精巧成果,使其与周边环境区分开来,并赋予其